

青年批评家集体出发

◇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笔谈◇

批评是一种创造

□李云雷

我以为,好的文学批评不仅是面向作品的,也是面向世界的。文学批评当然要面对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但是文学批评与文学作品一样,也是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文化语境的产物,都应该面向世界,都应该有对世界敏锐的观察与细腻的体验,只有这样的批评才会与时代保持血肉般的联系,才能有疼痛感与当代性,才能切入一个时代最为核心的精神命题,并能发现新的美学因素,引导文学的走向,创造出新的美学标准。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批评不是简单地对文学作品做出分析与判断,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当然是文学批评重要的内容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对我们借以评价的审美标准保持一种反思与开放性的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发现新的审美要素,才能与时代同步前进,才能创造出新的美学。

1980年代以来,我国的文艺思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很多人仍然沿用旧有的审美标准对当代作品做出评价,他们所思考的问题仍是30年前的问题,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已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他们不知道今天的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仍然沉浸在旧日的世界中无法自拔,无法应对文学界所出现的新问题与新现象,因而也就无法切入这个时代重要的精神问题,他们的文章也只能一再地重复自己,最多也不过变化了几个例子而已。所以他们的文章尽管理直气壮,写得很顺畅,但是却缺乏疼痛感与问题意识,缺乏与个人生命体验的联系,因此显得空洞乏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强调:批评是一种创造。我想,这应该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首先,批评是面向世界的,批评家应该对世界有新的理解与创造性的发现,应该有独特的观察思考与独特的个人体验;其次,在面向世界与尊重个人体验的基础上,批评家应该拥有自己创造性的文艺思想和审美标准,同时对这一思想保持开放性的态度,不断拓展自己的审美视野与美学趣味;再次,

尊重作家的创作与探索,具有艺术上的敏感,能够创造性地发现文学作品中的新的美学元素,并能做出深入细致的阐释;最后,在上述基础上,批评要创造出新的美学标准,这一美学标准不同于既有的对文学的理解,而是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拓展“文学”的概念,让文学能够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

如果我们认可批评是一种创造,那么批评的目的便是探索与发现,批评也就是勘探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是触及时代核心精神命题的一种途径,所以展现在批评面前的是一个未知的世界,需要批评去命名、去探索、去分析,在此之上提出新的问题,拓展新的领域。这样一个探索的过程,也是一个困惑与思索的过程,批评家需要从个人的生命体验与审美体验出发,去触摸一个开阔的世界,这样的过程也是迷人的,它不是以旧有的知识简单地评判一切,而是在进入世界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发现,不断形成新的知识,充满了发现的愉悦与乐趣。

李云雷 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2005年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批评与当代文化研究,主要论文有《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如何生产中国的形象?》《神话,或“黄金时代”的背后》《如何阐释中国与中国文学?》《秦兆阳:现实主义的边界》《新世纪中的“底层文学”论纲》《“底层文学”在新世纪的崛起》《我们如何想象农民?》《一个人的“金光大道”》《我们如何叙述农村?》《我们能否理解这个世界?》等,散见于《文学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作品与争鸣》《人民日报》《文艺报》《文学报》《文汇报》《中国艺术报》《小说选刊》《上海文学》等。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

做一个快乐的阅读者

□周立民

周立民 男,1973年生,辽宁庄河人。1996年大学毕业后曾任职机关、报社。2002年至2007年为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博士。2007年进入上海市作家协会工作,现为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巴金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学评论工作,有多篇论文发表,著有《另一个巴金》《冯骥才周立民对话录》《巴金手册》《精神探索与文学叙述》《巴金画传》《世俗生活与精神超越》《随想录》《稿》等,编有各类文献资料多种。

我不知道,在别林斯基的时代,批评是否有发现真理的使命,但我知道,在今天没有一个批评家敢于或者愿意把这顶大帽子戴在自己的头顶上。于是,我看到批评在学院化之后,又迅速传媒化;于是,我们终于迎来了文学批评声名狼藉的时代。那么,除了自怨自艾、愤世嫉俗之外,在这个时代,从事文学批评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这个问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于我而言,只是为了一份热爱——对于阅读的热爱;如果还有一点雄心的话,那是期望以自己的文字唤起更多人对文学、人生及一切令生命温暖的事物、情感的热爱。我知道现实远比这份炽热的爱冷酷,但哪怕是生造出来的梦想,我也要坚定这份爱。

因为沉醉于阅读,才会有一些批评文字的产生,不必讳言,它们都是我的读后感。没有阅读,不会写它们;阅读没有感想,也不会写它们。我无法为批评而批评,更不想让它们冒充某种学术,那样当然会抬高我的“身价”,却辱没了这些文字应有的温度和对阅读的自由之爱。因此,做一个快乐的阅读者比什么都重要,让这样的阅读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并丰富着生命,而不是让生命在“学术”中不断枯萎。正因

为这样,我认为体味生活、咀嚼生命比阐述学理、玩弄名词更重要,一个对生活毫无感觉的批评家,再系统的学理也会让他带到死胡同,再精彩的作品也不过是他的例证。——而好的批评家要能够让作品在他的阐发中楚楚动人地站立在人们面前!

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话,大约可以说明我的某种想法:

从本质上讲,我只是一个爱好者、业余作者。我很喜欢这种业余的状态,它是凭爱好、兴趣而来的一种自得其乐,而不是去完成任务和谋求什么。所以,我一直反对所谓的专业化的读书,我常常私下里想,如果那样岂不连本应有的一点点读书的乐趣也自我剥夺了?现在的都市生活已经够乏味了,可不要再去自讨没趣给负重累累的人生背上几座大山了。业余作者还有一条好处,那就是心里没有多少负担,用不着去“装”样子,也可以不守业内规矩;看到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可以五体投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看到那咋呼呼喊仁义的也可以嗤之以鼻。并非高明,旁观者清而已。当然,我最看重的是这种悠悠的业余心态和一股出于热爱的热情,当代学术日益体制化之后,它的从业者越来越缺少对于本专业的热情,读书作文都成为某种量化指标,说句不恭的话,长此以往,既没有“学”也不会有“问”了,有的不过是一群作戏的虚无党在高谈阔论而已。前几天,偶读钱锺书先生的《论文人》,其中说:“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得已,无可奈何。”接下来,钱先生“要而言之”:“我们应当毁灭文学而奖励文人——奖励他们不做文人,不搞文学。”话说得损了一点,但仿佛就是指着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的鼻子说的。

既然这样,还是做一个本分的阅读者,去享受阅读的快乐吧,至少可以免去很多“不甚得已”的事情……

“纯棉”的诗歌批评

□霍俊明

在科技理性和工具理性疯长的经济时代的深渊中,诗歌批评的黑色末日是否已经在不幸而又不可避免地到来?在我看来,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诗歌批评已经在工业化乌托邦的幻觉与狂欢的失重中踩空了踏板,大量的批评者充当了喜欢造势的诗人圈子的利益同盟者和权力分享者。我们看到了那么多肤浅、时髦而又受到追捧的时评家,也看到了沉溺和迷失于纵横交错的历史迷宫并丧失了与现场对话的“学院派”。而更为可怕的在于,中国的诗歌批评生态在不断的恶性循环而又不自知的境遇下,制造了大量的面对诗坛和文学史无力的失语者,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妄谈诗歌美学的暧昧强夺的时代。面对着同样的一个诗人和一首诗作,不同的批评者却会产生大相径庭的阅读和阐释,正是这种妄谈诗歌美学的集体症状使得诗歌批评已经失去了公信力,甚至加之1990年代以来个人化和叙事性美学的极度张扬和大众媒介的迅猛繁殖,诗歌批评成了愈发可疑的行为。后工业时代浮躁而又糜烂的气息充斥了文坛,更多的诗歌批评面带锈色,逐渐失去活力和有效性。

基于此,我呼唤“纯棉”的诗歌批评。在我看来,“纯棉”的诗歌批评就是首先进行祛除伪装、肤浅,刮除工业

批评在今天面临着困境。但是批评的困境并非来自批评本身,批评在任何时代都不见得比今天更幸运。因此所谓的困境,可能更大程度上缘于批评家自身的匮乏、软弱和不负责任。

今天的批评要有拒绝的勇气。布迪厄认为只有在对政治和商业的双重拒绝中,才可能获得文学场的真正自由。如果说1980年代文学和批评是以拒绝“政治意识形态”为己任,那么,当下的文学批评不仅要继续对“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变种和面具保持高度的警惕,更要对“商业意识形态”以及大众趣味保持判断的敏锐和批评的力度,只有真正独立于资本(政治资本、商业资本)以及通过资本建立起来的各种大小圈子、话语势力,才能发出有识见的、坦率的批评。这种批评要求我们不屈从于各种文学史的神话和文学史

的偶像,不退让,不含糊,不满足于那些十分渺小的作品,不去赞美那些所谓说得过去的作品,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要求的:“对于值得赞扬的作家一视同仁地赞扬,对于不值得赞扬的人则一概不歌颂。”(《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第1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

真正的批评要求我们怀有敬畏之心,要求我们对历史、对作家和作品保持足够的尊敬和最大程度上的理解。毕竟,我们只能在短暂的有生之年见证文学和历史的过程,生命太短促了,而文学和历史又是如此漫长,因此,理解当下文学就是理解我们渺小的个体在这个时代中的搏

斗和挣扎,而同情历史就是同情我们自己的局限和无能。惟其在“历史的同情和理解”视野中的批评,才会厚重踏实,才会逼近和洞彻我们的盲视和偏见,才能洞穿我们时代的语言腐败和精神腐败,从而作出恰当的判断、选择和裁决。

我们的时代需要真正有力的文学和真正有力的批评,我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我们时代的文学和批评持消极的悲观态度或廉价的乐观主义,这个时代更需要的是一种严肃的参与与勇气和践履精神,我愿意保持这种精神和勇气,秉持独立、坦率、理解的批评立场,去理解我们时代的文学和一切有创造力的精神形式。

杨庆祥 男,1980年生,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在《文艺研究》《南方文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天涯》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曾获《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第三届在南方最佳诗评人奖。著有《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与实践》《文学史的多重面孔——八十年代文学事件再讨论》等,主编有《文学史的潜力——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等。

诗歌作品见于《星星》《诗歌与人》《诗歌月刊》《青年文学》等,入选《2008年中国新诗年鉴》《中国当代汉诗年鉴》等多种选本。曾获《诗歌月刊》全国探索诗大赛一等奖。

以人的声音说话

□张莉

家把文本当做“社会材料”去分析,不关心作品本身的文学性,不注重自己作为读者的感受力,在这个模式的指引下,文学的审美功能被“理所当然”地忽略。我不反对文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也不反对研究者对理论的学习与化用。但是,我反对教条主义,我反对文学批评里充溢大量的僵化的理论词汇。这会使阐释文学作品的工作变成阐释“社会材料”的工作,进而这种隐蔽的教条主义形成了可怕的只从社会意义出发阐发作品的阅读批评习惯——一部作品是否具有可讨论的“文学性”、是否具有艺术价值、是否真的被打动则完全被人忽略。

批评家是人,不是理论的机器,他的存在不是为理论做“背书”,他须有个人的判断力和审美力,他须表达他对作品的体悟力和感受力。我认为,在当下的批评领域,在占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人的主体性应

该重新受到重视和强调。文学批评不能只满足于给予读者新的信息、重新表述前人的思想,它还应该反映作者的脑力素质,应该具有对作为文学文本的作品进行探密的勇气与潜能。我以为,既有精神洞见、又有文学审美能力的文学批评才是好的文学批评。

文学是庞大、富饶、令人沉迷的宝藏,人类生命因之而更丰盈、更有光泽。文学阅读是美好而快乐的事情,它是含英咀华的生命和艺术享受。而批评文字本身也该是艺术品:好的批评文字会为它的批评对象重新注入新的能量和生命激情;好的批评须“随物赋形”,须生动细腻,须缜密严谨;它须有呼吸、有体温、有气味、有眼泪;它须有困惑、有智慧、有幽默、有反讽、有感慨;面对浩大而喧哗的世界,它须具有人的主体性和审美力量;并且,它也须写得美。世界上一切好的文学批评都具有迷人的共性:“正如一切伟大著作一样,它带着鲜明的个人印迹;它以人的声音说话”(桑塔格语)。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张莉 女,文学博士。曾在南开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女性写作发生与发展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出版学术专著《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承担并完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性别视域下的文学与文化”子课题“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现代女性形象的生成”。目前主持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社会性别识别与新世纪女性写作的转型”研究工作。在《文艺争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开学报》等发表论文十余篇。论文《两个高贵的文学启示》获《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2009年度);论文《浮出历史地表之前:女学生与现代妇女写作的发生(1898—1925)》获中国妇女研究会第三届妇女/性别研究优秀博士论文二等奖(2010年)。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以冰饲火的灵魂冒险

□房伟

房伟 男,1976年生,山东济南人。2009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2005年至2009年为山东社科院文学艺术研究室副主任,2009年调入山东师范大学工作至今。山东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山东艺术学院特聘研究员,山东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东岳论丛》《诗刊》《山花》《作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及诗歌、小说计120余万字,曾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复印报刊资料》、《小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著有《批评的表白》《文化悖论与文学创新》《屠刀下的花季》《影视作品分析》等,获第19届世界诗人大会铜奖,山东省研究生科技创新奖等,主持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参与4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

这是一个批评繁荣的时代。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批评理论,使我们获得了华丽无比的武器,也使我们身陷错综复杂的时代之中。作为现场性、意识形态性强的文学理论模式,选择了文学批评就是选择了学术和灵魂的双重冒险。有人说,文学批评是最“喜新厌旧”的学术职业。文学批评,大众关注度高,追踪最新作品和理论创新,必须成为最先锋的理论机器。也有人说,文学批评是最浮躁和含金量低的学术职业。因为要“追新逐后”,所以要“花言巧语”,甚至故作姿态,或不断制造“文学事件”。也许,作为文学批评家,最大的悲哀恰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读不懂”,二是“读了没意思”。文学批评如果过分强调理论深刻性、宏观性,就会让大多数读者望而却步,但如果过分强调批评通俗化,又会导致批评姿态过低,成为“媒体快餐”和“大众闲话”,如果

过分强调批评尖锐性,会失之公允,但过分强调严谨性,又会丧失锐气。如何处理这些棘手情况呢?我认为,文学批评恰恰是一个“以冰饲火”的尴尬而危险的职业。因为文学批评现场性强,所以更要警惕成为二手理论家,所有理论都有其特定效应场域,而我们时代的批评,一个非常明显的缺陷,就是不懂装懂的东西太多,再精粹的外国理论,也需要经过中国现实语境的检验和磨合。我们需要的是从自己的土壤中长出的理论,是我们这个人人口众多、有着悠久传统的国家现代转型的故事,所呈现出来的独特经验和理论体系。

过分强调批评尖锐性,会失之公允,但过分强调严谨性,又会丧失锐气。如何处理这些棘手情况呢?

我认为,文学批评恰恰是一个“以冰饲火”的尴尬而危险的职业。因为文学批评现场性强,所以更要警惕成为二手理论家,所有理论都有其特定效应场域,而我们时代的批评,一个非常明显的缺陷,就是不懂装懂的东西太多,再精粹的外国理论,也需要经过中国现实语境的检验和磨合。我们需要的是从自己的土壤中长出的理论,是我们这个人人口众多、有着悠久传统的国家现代转型的故事,所呈现出来的独特经验和理论体系。

过分强调批评尖锐性,会失之公允,但过分强调严谨性,又会丧失锐气。如何处理这些棘手情况呢?

我认为,文学批评恰恰是一个“以冰饲火”的尴尬而危险的职业。

也许,正是在“以冰饲火”的过程中,批评才能建立既尊重文本又坚守自身、既尊重学理又坚守现场感的独特审美品格。批评要像犀利的冰锋,割开所有雾障和谜团,批评又应像柔情的火,能融化所有人心的障碍与作品内核的创伤。优秀的批评不仅能为我们提供理解文本的武器,而且能因此展现出身优雅的批评语言建构与思想的感性体系。它不仅是慷慨激昂的批判,也不仅是多愁善感的情绪,它凝视思想、政治和社会,却善意地与它们保持距离。它是情感和智性的审美体验,人性深度和隐喻性的结合,而不是认识论和本质论的“社会报告”。

这是一个特别需要解读的时代,很多前所未有的文学形式,很多前所未见的文化现象,像万花筒一般刺激着我们了解时代的欲望。然而,这又是一个难以解读的时代,不仅有解读本身的难度,而且是那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早已超出了文学的边界,成为一个山峦层叠、迷雾重重的谜语,只有拥有勇敢的心、睿智的眼睛和真诚的灵魂,才能真正以独立而审美的批评品格,成为这个时代优秀的阐释者。

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

□梁鸿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我自己从事的职业,对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充满了厌倦和怀疑,我无法控制自己的厌倦,一切都找不到精神的支撑点,找不到意义所在。作为一个虔诚的文学青年,我对文学、写作的热爱从来没有改变过,但长久以来,它又几乎成为我厌倦的源泉。

2008年,利用寒暑假的时间,我在老家村庄住了将近三个月,我把这次行动作为自我心灵的救赎。漫游在大地,一切都千疮百孔,但又生机勃勃,我似乎有些明白我的厌倦与怀疑从何而来。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传统与现代、荒凉与生机、失望与希望,以前所未有的矛盾方式纠结在一起。只有深入到它的肌理,体会它身体血脉的缓缓流动,你才能意识到,这一矛盾有多深。精神的犹疑是这个时代病症的外现。

文学批评遭遇了什么样的困境?时代没有了核心精神,一切在“多元化”的名义下变得似是而非,并且被赋予了合理性,这也意味着没有什么东西更值得叙述。对于文学而言,充满“灵光”(本雅明语)的文学正在消逝,这一“灵光”不仅指文学中乡愁、大地、天空及与之相关的神韵的丧失,而是指心灵在逐渐丧失对这一“风景”的感受力与理解力。如何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学的大课题。

我羡慕那些有坚定立场的批评者,我无法做到,因为在我有限的知识结构中,我很难找到支撑它的完全理由,我无法把自己完全交付出去,我总是怀疑这样一种交付,也痛苦于自己立场的不确定。但我又希望能够在这“不确定”之间寻找到新的道路,能够在文学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之间建立一种跨学科的联系,把文学置于更大的语境,重新发掘文学“介入”公共空间的可能性;同时,又避免被“立场”和“知识”所遮蔽,试图以相对冷静的目光穿透文本,寻找它作为文学的精神特质,及其与时代精神、文化思潮、政治倾向之间的复杂关联并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发言”并不意味着某种真理式的肯定或否定。文学的立场并不只有一种,文学批评的立场也并不只有一种。它们通过许多个方向。用一种文学观念来衡量所有的文学作品是批评的“暴力学”,当然,用无数相对的观念来评价不同的作品,也是一种“批评学”。对于我而言,我愿意,或者,只能做一个文学的体会者与历史的质疑者,不是判断,而是分析,不是指导,而是思辨。文学批评并非只是阐释,它有文体、体温与洞见,在这里面,渗透着论者对文学的深刻理解,渗透着对生命、民族、人类的大热爱。借此,才能在文学的个体秘密与公共性之间找到某种通道。

或许,正是那不断涌来的厌倦,那充满谦卑的痛苦与犹疑,还有那仍然在原野中默默屹立的故乡,促使我不断思考,去迎向这“灵光”消逝的年代。

梁鸿 女,文学博士。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艺思潮研究。发表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学术专著《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学术对话《巫婆的红娘子——作家与文学博士对话录》。曾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获“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2009年度《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2008年度当代作家评论奖”、《中国在梁庄》入选“新浪2010年度十大好书”、“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类好书”、“《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现任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